

内生宏观经济政策、技术引进与 经济发展: 方法论视角的理论进展^{*}

□ 王 勇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对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内生宏观经济政策和技术引进问题作一个非技术性的选择介绍和方法论探讨。文章将以中国和印度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及相关政策差异的经济学分析为例,向读者展示这类研究的一般方法,并穿插介绍近年来相关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文献的进展,展示不同理论之间在探讨因果关系时对不同解释变量的比较和侧重及其解释力的区别。文章最后归纳介绍了这一领域三个具有跨学科性质和工具性意义的经济学模型。

关键词 内生宏观经济政策 技术引进 经济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
作者王勇,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

一、问题的引出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世界上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之一就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龙象之争”受到了国际学术界、工商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①亚洲的这两个国家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国而印度则是在1947年独立。两国在1950年代到70年代都有很明显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的特征。两国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市场化经济改革,随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速度。尽管如此,中印仍然都属于“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都超过10亿,共占世界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二,而人均GDP在2005年仍然都排在全世界的100名之外。

但有趣的是,在吸收对外直接投资(FDI)这

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上,这两个国家却存在着巨大差异。30年前两国的FDI都几乎为零,然而,在2005年,中国大陆吸收的FDI流量将近720亿美元,竟是印度的12倍!^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么大的差距?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影响FDI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就要素价格而言,中国吸引的外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做出口加工贸易,可是印度劳动力平均成本比中国还要便宜,2005年印度的人均GDP为680美元,还不到中国的一半。就政治风险与产权保护而言,印度是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而中国宪法则明确规定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投资障碍而言,印度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英语的普及使用要先于中国。这些因素在理论上都应该更有利于印度吸收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FDI^③可为何事实却会恰恰相反呢?

^{*} 作者感谢胡伟俊、皮建才、赵红军、章奇、王鹏飞、白金辉、管毅平、姚远、陆铭、刘臻、卢杨、韦森、李志赞、陈林峰等人的批评、建议和讨论,文责自负。

显然,我们很难单从两国经济基本特征的差异找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经验观察告诉我们:在中国,各地政府的主要党政领导都非常积极地争取吸引外资,为此不但在市政硬件设施上都作了巨大投资,而且在软件设施上也争相为境外投资者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外资企业所享受的待遇甚至都远远超过了本国企业,以致于产生了资本绕道回流(round-tripping)的奇特现象,即有些大陆的资本先以各种隐蔽的方式绕过资本项目管制流入香港等地,然后再假借外资名义回国套利。^④然而在印度,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为了增强本国已有企业的竞争力,取消了很多经济管制,但是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直到90年代初,印度的国际收支危机才触发了真正的对外开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地方政府之间对外资的争夺亦远远不如中国那么激烈。2005年印度对外资企业的利润税为41%而中国则不到30%。另一个间接但可观察的证据就是印度各地的道路交通等市政建设相对于中国而言显得非常落后。这些事实提示我们,中印两国FDI存在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政府对FDI的欢迎程度和政策优惠不同。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政策会不同?这就涉及到所谓的内生经济政策问题。

二、内生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中,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主要是规范性的(nomative),即给定一个外生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家们构建一个高度抽象和简化的理论模型作为思想实验室,分析该政策所产生的客观的福利后果,然后对其依照某种标准进行比较,最后给出最优政策“应该如何”的建议。然而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学家开始进行实证性的(positive)的政策分析,即在现实中不同的经济政策究竟“是什么”,考察它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推行等一整套政治过程,涉及到政治与经济制度,涉及到各社会阶层不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这种研究无疑更加贴近了现实,但分析难度也大大提高了。

从研究内容来看,经济学家们对内生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现在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自由贸易是

最有经济效率的,但是国际贸易却一直不是自由的。所有国家仍然对本国企业采取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政策,至今各国之间仍然在进行着艰难的多边谈判。即便在非常崇尚经济自由的美国,保护主义也得到很大的政治支持。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曼昆教授就是因为坚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而被迫提前卸任。这些都促使国际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认真地去考察现实世界中与贸易政策相关的政治过程。^⑤

(2)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理论家们曾形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一致认为转型应该一步到位。但是奉行这种“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却发生了持续而严重的产量下降、大量失业和社会动荡。而遵循渐进改革路径的中国却稳步地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促使制度与宏观发展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重视经济改革的经济与政治的可行性问题。^⑥

(3)经济学家们发现,世界各国的经济绩效存在巨大差异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可是为什么很多落后国家就是不引进和吸收现有的、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呢?这促使宏观与发展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究竟是什么经济与政治力量阻碍了很多穷国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我们将在第四节中对此作更加详细的讨论。^⑦

(4)跨国比较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不同的发达民主国家在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以及政府开支占GDP比例上居然也存在着持续的巨大差异。研究发现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及政府的财政政策都与选举制度系统相关,比如议会制国家平均要比总统制国家有着更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和更高的政府开支比重。这些促使宏观与公共经济学家们去系统地考察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政治制度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⑧

(5)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诺斯认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其实是经济增长的本身而不是增长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效率。那么为什么很多落后国家的非效率的制度能够长期延存?制度惯性与动态的微观机制是什么?法律作为社会契约究竟如何影响制度效率?民主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促使制度与宏观经济学家,包括演进博弈论者,都不得不审视社会各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对

于政策与制度的不同偏好与需求,探求社会的法律起源,以及其它因素对制度动态的影响。^⑨

从分析方法上来看,在经济政策与制度形成的政治过程中,几乎不存在显性的市场价格来引导政治力量与资源的均衡配置。该过程几乎总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策略性的互动。这就使得博弈论在内生经济政策分析中大有用武之地。因此很多博弈论学者近年来纷纷转入研究政治过程中的投票、选举、政党、民主等问题。当然,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如今博弈论在产业组织与公司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要做出新的突破也许更难了。

内生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许联系宏观经济学的整体发展图景来看会更加清楚。基于完全信息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基准范式已经日趋成熟。该模型的制度结构以市场竞争与交易为核心特征,在给定的偏好、禀赋、技术假设下,市场制度以均衡价格的形式来协调各优化主体之间的选择以满足相容性的资源约束。但是还有很多宏观经济现象涉及不完全信息、不完备市场、不完备契约等问题,我们在分析时必须将这些新的制度特征与信息结构在模型中做得更加丰满。事实上,我们的确看到近二十年来的宏观理论发展中,国内与国际金融中介市场(financial intermediation)以及政府国际债务问题(sovereign debt)、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税收问题、动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风险分担(risk sharing)和失业保险设计问题、非共同知识(uncommon knowledge)条件下的各分散经济主体之间的投资和汇率攻击等协同问题(coordination game)、以及理性的“羊群行为”(herding behavior)等等,都开始考察非价格协调下的博弈均衡行为。在这一趋势下,对内生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数理建模也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尤其是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经常是缺失的,而作为规则制定者、修改者与执行者的政府在经济体中还经常充当直接的参与者,因而价格信号经常是失真的,导致各优化主体不得不基于其它非价格信号来决定经济行为,因此我们经常无法完全撇开政府而以标准的市场一般均衡框架来探讨发展问题。

制度政策分析与市场行为分析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科斯定理的适用性。科斯定理指

的是,只要产权界定清楚,市场完备,那么经济资源的配置就一定能实现帕雷托效率,而与产权如何配置无关。然而,在政治过程中,政治权利的清晰界定却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达到具有经济效率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另外,法律上的(de jure)政治权利与实际(de facto)政治权利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政治地位低下的社会阶层有可能通过暴动或者政变来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这种潜在的对政治权力与结构进行再分配的能力,尽管没有制度保障和法律的明确承认,却也会对经济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三、地方政府竞争与实际产权保护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的例子。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这么积极地争取外资,一个最直接的解释可能就是外资的吸收量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核指标?换个角度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形成有效的政治联盟对政府施加足够大的影响以抵抗外资进占中国市场?从外资的供给来看,为什么境外投资者相信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级政府会从法律上严格保护而不是没收和国有化他们的产权?^⑩这些都很难讲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但的确确实是经济学家们为理解现实经济现象而绕不过去的问题。^⑪

从近年来中国的外资来源构成来看,来自美欧国家和日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很多主要是瞄准了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比如房地产、汽车与信息电子产品消费。在这些行业中,外资企业在与本国企业形成了争夺市场的替代性关系。国内企业,包括很多国有企业,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润,自然会形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有激励联合起来动用一切资源给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通过制定关税和企业各税率等各种措施来遏制外来投资者的竞争。

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是极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标准,这是因为中国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形成了实质上的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钱颖一和Roland(1998)分析了这种财政联邦主义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克制作用。Shleifer和Banchar(2001)则指出中国比俄国的财政联邦主义远为

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更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协调各地方政府的的行为,而这一点也保证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可操作性和效率(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为便于分析,让我们先忽略地方间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该地的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收,这些税收收入按照事前比例与中央政府分享。因此,如果国内企业,尤其是很多国有企业,因各种原因总体经济效益不好,那么外资企业就更会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与青睐。^⑩

但是地方政府又有哪些政策变量可以使用呢?面对强大的中央政府调控,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法律上没有太多的政策自由度,比如无法像美国州政府那样可以通过立法来直接改变税率以争取FDI,但是有其它很多途径影响外来投资者的商业利益,比如可以通过对土地转让的控制权、各种商业承包的拍卖权、卫生质量检测、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公共品提供、涉及外资企业的司法裁定与执行、有关商业行政管理的手续、国有金融机构的服务等等对外资企业进行歧视,以增加其商业成本。我们把这些笼统地归纳为影响外资企业的实际的(de facto)产权保护成本,因为这些是外资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商业运作,而不得不支付的,但本不应当承担的制度成本。^⑪这与目前中国的法制尚不健全、信息不透明、相关制度供给不足或者不配套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为官员个人寻租行为提供了制度土壤。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同指标的量化考评(Yardstick competition),而且具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因此如果政治激励与经济激励同时促使各地政府对于外资进行激烈争夺,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竞争性地降低外资企业的实际产权保护成本,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制度补漏过程,优化了的相关政策的经济效率。^⑫

作为潜在的境外投资者,他可以选择通过出口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也可以选择绕过贸易壁垒到中国直接投资,当然还可以选择既不出口也不投资,这取决于利润的比较。如果中国的进口关税越高、外资企业的税赋越低、实际产权保护成本越低、劳动力成本越低,那么投资者就更愿意进行直接投资。反之,则更愿意通过出口而不是直接投资来进占中国市场。作为国内的普通的居民

户,他们一方面作为劳动力供给者在竞争性市场上工作赚钱(有一部分居民还拥有国内企业的产权,因此他们的收入中还包括企业的利润分红)。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他们在垄断性竞争的产品市场上购买各种国内外的消费品,自然希望低物价(从而低关税)和消费品多样化。

作为中央政府,它不仅关心来自企业税收和关税的财政收入,也关心全体国民的平均福利水平,同时它也受到各利益集团的游说与压力。中央政府必须在这些目标之间做出权衡,制订相应的关税税率与企业税率。给定关税水平,如果所制定的外资企业税率相对于国内企业税率过高的话,一方面会提高地方政府对FDI的需求从而诱使地方政府降低其实际的产权保护成本,但另一方面却会降低潜在投资者的FDI供给;相反,如果外资企业税率相对过低,那么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主要依靠国内企业,而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又是竞争性的,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对FDI的需求下降,从而诱使其提高实际的产权保护成本以达到遏制外商进入的目的,尽管低税率有利于提高潜在投资者的FDI供给。因此,税率过高或者过低都会使均衡FDI为零。最后均衡的实际产权保护成本和FDI水平取决于内生于各政治经济力量博弈的关税税率和企业税率。如果本国企业利益集团足够强,或者平均国民福利在实际的中央政府目标中不够重要,或者中央政府足够弱(体现在与地方政府的企业税收分成比例足够低),那么就会使得政治过程中所决定的外资企业税率过高,而且关税也高,FDI供给为零。反之则反是。另外,对于既定经济政策,如果国内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的经济绩效越差,则越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对外资企业的进入壁垒从而引进更多的外资。

可见,关于FDI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要涉及到多级政府、境外潜在投资者、国内居民、本国企业等多个利益集团之间的交互行为,既有市场价格的指导配置作用,也有影响经济政策的政府博弈行为。实际上,上述讨论正是对笔者(Wang 2007^a)数学模型主体部分的语言复述。在那里,我们构造了一个具有单个中央政府和两个对称的省政府的经济模型,考察中央政府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如何决定最优的关税税率和对FDI的利润税率,从而诱使地方政府对FDI采取欢迎或

者抵制的态度,体现为外国投资者实际产权保护成本的大小,最终决定均衡的FD水平。为此,我们严格定义了一个同时满足市场出清和纳什均衡的政治均衡,证明了这个均衡的存在性。我们还证明,这样的均衡只出现两种极端情况:要么实际产权保护成本很低(即政府对FD持非常欢迎的态度)而吸收的FD总量很高;要么实际产权保护成本很高(即政府对FD持非常抵制的态度)而吸收的FD总量为零。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具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和印度,虽然都是财政联邦主义,政府对于FD却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欢迎态度和经济政策,从而迥然不同的FD水平。根据模型的提示,我们认为印度中央政府没有中国政府那么强势(体现在与地方政府的企业税收分成比例更低),而且印度的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平均相对经济绩效要高于中国,这两点导致两国均衡的分岔(bifurcation)。笔者利用中国和印度的数据进行校准实验(Calibration)所得到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理论结果的有效性。这个模型也许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正式制度缺位的条件下,竞争仍然可能导致政府对于外资的产权进行实际有效的公共保护并且能够吸引大量FDI^⑤

本文之所以选取发展中国家的FDI作为例子,是因为它不仅仅是资本流入问题,更是生产与管理技术的引进问题,这些都是宏观发展经济学中与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Boixensztejn, De Gregorio and Lee(1998)的实证研究表明,FD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资本的投资率的提高。对于中国来说,总的FD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也只有10%左右。另外,数据研究表明,1994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TFP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制造业,也就是中国吸收FD最多的部门;而印度TFP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服务业,也就是印度吸收FD最多的部门。这些证据都支持FD对于中印两国TFP的促进作用。

四、技术引进与经济发展

粗略地说,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知识技术或者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而通过贸易交流,学习培训等渠道自然地实现生产

力的提高。^⑥另一种是有意识地采纳选择新的生产管理技术。在这里我们只讨论第二种情况中与政治过程有关的假说。

Parente and Prescott(2000)认为很多落后国家之所以没有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是因为这些国家原有的企业主,或称为在位者,为了维持其原有技术的经济垄断利润而阻挠新技术的采纳。但是Acemoglu等人(2006)提出:如果在位者有足够强的政治力量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允许别人采用新的技术,从而生产更多的产品,然后只要对其征税就可以了。所以在位者不吸收新技术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避免经济垄断力受到威胁,而是避免政治垄断力受到威胁。他们进而讨论民主制度和威权制度对于先进技术的采纳的阻力大小。Krusell and Røpsh-Rull(1996)构造了一个有限期的动态政治经济学模型,指出有些人之所以抵制新技术的采纳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他们以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过时。还有些专门研究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生产力与技术也都很成熟的国家,经济学家们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力量分布使得工业革命在英国最为可行。另外,Acemoglu, Antras and Hellman(2007)证明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中的契约制度不完备,则它倾向于吸收低端的技术。

林毅夫(2007)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效率低下,问题不是采纳的技术太落后了,恰恰相反,而是太“先进”了!比如,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和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都认为富国强兵的要务在于尽快发展重工业,因为他们观察到最发达的西方国家都具有庞大的重工业,但是这种与要素禀赋结构不相称的重工业企业是不具备自生能力的,所以这些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就只好通过政府行政干预的方式,将经济中的剩余尽量地往重工业转移。这种赶超型发展战略必然导致承担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而信息不对称又导致了“预算软约束”,从而形成了一系列严重的价格扭曲,经济管制,和国有银行呆坏账。因此,他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循比较优势,采用与经济禀赋结构相一致的生产技术,先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才能通过出口等各种方式最有效率地积累资本并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⑦

在我们的数学模型中,吸收FD就意味着本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原来不能生产的产品,因此这完全可以看成是关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问题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模型,该模型突出了财政联邦主义下的科层式政府内生政策问题和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方面的激励相容性问题。

五、几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简介

与其它很多社会科学不同,经济学中的思想需要有好的数学模型来刻画和传递。因此,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们将扼要地介绍三个关于内生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模型。^⑧笔者认为它们是具有工具性意义的重要分析范式。这不但直接有助于我们理解前面所提到的文献,而且也许还有助于其它学科的读者从方法论意义上了解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将从政治学和社会学那里所获得的支援意识(subsidary awareness)作正式的政治经济学表达的。

1. 共同代理人模型(common agency) 这个模型将政府作为共同代理人,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有数个利益集团(special interest group)。这些利益集团相当于多个委托人(multiple principals)。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常常会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和利益冲突。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同时向政府递交一份政治献金的计划表,承诺在不同政策组合下给予政府的献金数量。当然,最符合该集团利益的政策组合则对应着最多的献金以诱使政府采纳他们最偏好的政策。然后政府根据收集上来的政治献金计划表,选择一个最大化其目标函数的政策组合,该目标函数通常不仅包括得到的总献金收入,还包括其他独立的政治目标,比如社会福利。这种模型本质上属于菜单拍卖(menu auction),这方面的系统性介绍和讨论,特别是关于贸易政策的方面的应用,可以参见Grossman and Helpman(2001)以及Dixit(1996)等。虽然这个模型在现有文献中主要应用于像美国这样的发达民主社会,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模型框架也比较适用于像中国这种具有强势政府的威权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不需要考虑选举问题。而政治献金计划表可以理解为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各种隐性或者显性的讨价还价。在第三节所讨论的模型中,我们就运用了共同代理人模型。

2 中间投票者模型(median-voter theorem)

这个模型主要用于分析民主国家中通过投票进行的政策制定过程。在宏观经济学上的一个经典应用是关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问题。Benabou(1996)对此做出了十分精彩的阐述。社会上投票者的收入分布一方面影响再分配政策,另一方面也被再分配政策所影响。如果是一个精英化的或者右倾的社会,则中间投票者是富人或者支持富人的人,所以导致政治均衡中的资本与收入所得税比较低,而失业保险金等也比较低,因此投资率和就业率都比较高,经济增长比较快。与之相反,如果是一个像法国这样左倾色彩比较浓重的国家,中间投票者可能是穷人或者同情穷人的人,因此资本与收入所得税以及失业保险金都比较高,所以投资率和就业率就比较低,经济增长就相对比较缓慢。当然,中间投票者模型只是众多投票模型中最为常用和简单的一个,对于其他投票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介绍可参见Myerson(1997),Grossman and Helpman(2001),在宏观经济学上的应用可参见Persson and Tabellini(2001)。

3 社会冲突模型(social conflict) 前面两种模型都是有秩序的政策决定过程。但是对于制度相对混乱的特别是私人产权保障不力的社会,各集团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掠夺的方式控制资源分配。一个精彩的模型是Benhabib and Rustichini(1996),在纳什-马尔可夫均衡中,由于公共地悲剧造成过度消费和投资不足,导致低经济增长率。^⑨这个模型与宏观经济学中近年来广为应用的单边或者双边无约束力的动态契约(dynamic contract lack of one-sided or both-sided commitment)理论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Acemoglu等人(2006-2007)也构建了精英与普通大众的两阶层冲突模型,讨论了内生的产权保护制度,因承诺问题(commitment)而引起的选举权利制度化,以及民主与非民主制度之间的切换等一系列制度与内生经济政策问题。

注释:

①对于中印两国1994年以后的宏观增长比较分析,可参见Bosworth and Collins(2007)。

②印度FD的统计方法与国际通用的MF方法不太一致,有低估的倾向,但是即便经过调整以后,印度的HDI仍然大大地少于中国。

③诚然,就供给而言,中国大陆的很多 FDI来自港台与海外华侨,可是外籍印度裔商人也非常成功。

④对于资本绕道回流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参见 Huang (2003)。剔除绕道回流的资本以后,中印两国的 FDI 仍然存在巨大差异。

⑤关于这方面的精彩综述与详细介绍,可参见 Grossman and Helpman (2002) 和 Dixit (1996)。

⑥这方面的具体讨论可参见 Roland (2000); Lin (2007); Lap Qian and Xu (2000);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Sachs Warner Aslund and Fischer (1995), 等。

⑦可参见 Hall and Jones (1999); Parente and Prescott (2000); Russell and Ross-Rull (1996); Acemoglu et al (2005 2007), 等。

⑧这方面的精彩论述包括 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1 2003); Alesina and Rodrik 1994; Benabou 1996; Myerson (1997); Djankov Glaeser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 (2003), 等。

⑨可参见 Acemoglu et al (2006 2007); Glaeser and Shleifer et al (2003); Barro (1996); Knack and Keefer (1995); 培顿·扬 (2004), 等。

⑩根据 OECD (2000) 的一个系统性报告,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件关于外资企业被国有化或者直接没收的报道。限于篇幅,本文略去关于 FDI 产权保护的详细讨论。这方面的文献梳理,可参见 Wang 2007^a。

⑪其他社会学科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曾有不少的批评。但在笔者看来,很多情况下经济学家是不知不觉地被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和好奇心“诱拐”到其他学科范畴的,“帝国主义者”有时真的也很无奈!

⑫Wang and Hu (2007) 在 Wang (2007^a) 基础上结合不完全契约理论发展了一个同时包含促进出口政策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内生经济政策对 FDI 和出口结构的影响。该模型试图解释为什么江苏吸收的 FDI 是浙江的两到三倍,而且浙江的出口主要是一般贸易但江苏则主要是加工贸易,尽管两省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该模型揭示由于外生原因,浙江具有一个活跃的私营企业部门,而江苏则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前者要高于后者,这种本国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差别导致了这两个省政府在引进外资企业方面激励的差别。比如江苏省具有 7 个主要的外资企业经济区,而浙江只有三个而这种生产成本和契约的内生不完全性还导致了两省出口结构的差异。实证结果也验证了模型的结论。

⑬这种实际的产权保护成本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它对于国外潜在的投资者而言经常是非共同知识 (uncertain knowledge)。Wang (2007^a) 初稿中运用 global game 分析了这种不完全且非对称的信息结构对于均衡 FDI 的影响。

⑭与苏联那种以部门为单位的 U 型政治管理构架相比,中国的以地方为单位的 M 型政治管理构架要比前者更有利于促进有效的政治竞争与考核,而且还有利于推行地方性的政策试验,使渐进式改革也更为可行。见 Maskin Qian Xu (2000), etc

⑮当然,投资者也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产业组织方

式,比如与国内企业合资等等,来规避政治风险,降低实际的产权的私人保护成本。最近的文献主要是集中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下的讨论。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就不做深入讨论了。

⑯可参见 Lucas (2001), Know and Rodriguez-Care (2004), Wang (2006), 王勇与楚天舒 (2002), 等。

⑰鞠建东、林毅夫和王勇 (2005) 回顾了最近的关于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的文献,发现比较优势仍然是决定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另外, Basu and Weil (1998) 也讨论了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传递与条件收敛之间的关系,指出应该引进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适宜技术。

⑱关于内生微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比如产业垄断和规制,一个通俗却又精彩的综述是 Laifont 2000。该书重点讨论了在委托代理框架下由于信息不完全或者契约不完备而产生的政治过程中的激励问题。

⑲王勇 (2004) 将该模型推广至更高维,从而可以分析发展中国家社会各阶层的内生性联盟 (endogenous coalition) 等问题,后来他又着重分析了异质性社会集团的生产率分布和政治力量分布对于这个内生性联盟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Wang 2007^b)。

参考文献:

1.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200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_____, "Persistence of Powers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forthcoming
3.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Long-run Growth",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Philippe Aghion and Stephen Durlauf eds, 2005 North Holland
4. _____, and Pierre Yared "Income and Demo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forthcoming
5. Acemoglu Daron Pol Antras and Elhanan Helpman "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 (June): 916-943
6. Aghion Philippe Alberto Alesina and Francesco Trebbi "Endogenou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119: 565-612
7. Alesina Alberto and Rodrik Dani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 (2): 465-490
8. Barro Robert "Democracy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Vol 1: 1-27
9. Basu Susan and David Weil "Appropriate Technology and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113 (4): 1025-1054
10. Becker Gary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3 98 (3): 371-400
11. Benabou Roland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Ben S. Bernanke and Julio Rotemberg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6 1996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1-74

- 12 Benhabib Jess and Rustichini Aldo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 125—142
- 13 Blanchard Oliver and Andrei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with O. Blanchard),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How Much Progress?* 2001, MF Staff Papers
- 14 Borensztein E., J. De Gregorio and J—W Lee “How Does HDI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45: 115—135
- 15 Bosworth Barry and Susan Collins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2007, NBER Working Paper 12934
- 16 Dixit Avinash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Cost Politics Perspective, 1996, Cambridge MIT Press
- 17 Djankoj Simeon, Edward Glaeser,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31(4): 595—619
- 18 Grossman Gene and Ehanan Hellman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2001, Cambridge MIT Press
- 19 ———, *Interest Groups and Trade Policy* 200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 Hall Robert and Charles Jones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 83—116
- 21 Huang Yasheng Selling Chin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200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 22 Klenow Peter J., and Andres Rodriguez—Cáre “Externalities and Growth”, 2004, NBER working paper 11009
- 23 Knack Stephen and Philip Keefe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995 7: 207—227
- 24 Kruse Per and J V Røps—Ru “Vested Interests in a Positive Theory of Stagnation and Growth”, 1996,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3: 301—329
- 25 Laffont Jean—Jacques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Economy, 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6 Lau Lawrence, Yingyi Qian and Gerard Roland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08(1): 120—143
- 27 Lip Justin Yifu Marshall Lectures Introduction manuscript, 2007, CCEP Peking University
- 28 Lucas Robert E 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 200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9 Maskin Eric, 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 “Incentives,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0 67(2): 359—378
- 30 Murphy Kevin M.;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07(3): 889—906
- 31 Myerson Roger Game Theory: Analysis of Conflict, 199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 32 ———, “Economic Analysi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 Introduction”, in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etrics*, eds BYD Kreps and K Wallis, 19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3 Parente Stephen and Edward Prescott Barriers to Riches, 2000, Cambridge MIT Press
- 34 Persson Torsten and Guido Tabellini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 2002, Cambridge MIT Press
- 35 ———,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nstitutions*, 2003,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36 Roland Gerard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Market and Firms, 2000, Cambridge MIT Press
- 37 Sachs Jeffrey D., Andrew Warner, Anders Åslund and Stanley Fischer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1995,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118
- 38 Wang Yong Endogenous Polici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Federalism: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India, 2007a, Mime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39 ———, Endogenous Social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7b, Mime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40 ———, Institutional Barrier, Learning Externalities and Catching Up, 2006, Mime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41 ——— and Weijun Hu Political Competition, Contract Incompleteness, Export Pattern and FDI: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wo Chinese Provinces, 2007, Mimeo
- 42 鞠建东、林毅夫、王勇:《要素禀赋、专业化、贸易的理论及实证——兼与杨小凯先生商榷》,《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
- 43 林毅夫:《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2006年。
- 44 盖瑞·米勒[美]:《管理的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王勇等译,韦森校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45 王勇:《内生性联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文汇》2004年第4期。
- 46 王勇、楚天舒:《不确定性下的创新、技术传递、人口政策与经济增长: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经济科学》2002年第五期。
- 47 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 48 培顿·扬[美]:《个人理性与社会结构:一个制度演化的博弈理论》(中译本),王勇译,韦森校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 董希望

Endogenou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5)

Wang Yo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a non-technical and selective introduction to the substance and methodology of the endogenous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in the macro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literature. For concreteness, we demonstrate the general approach by showing as an example how to analyze the huge difference in the FDI policie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mong which we also summarize some recent progress in the literature. Lastly, we introduce three pivot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 models in this area.

Keywords: Endogenou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echnology adop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FDI

Size Estima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 Data Comparison Method (33)

Xu Aiting (College of Statistics & Computing Scienc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atistical connotation and statistical boundary of Informal Sector and advances a new size estimation method Data Comparison Method. Moreover, it applies the method to estimate the size of the Informal Sector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draws a relatively objective conclusion.

Keywords: Informal sector, Estimation method, Economic census

The Wenzhou Model of China's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40)

Zhou Jun, Yu Jianxi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Scholars in the sphere of China's civil society research are much cautious about getting into the trap of "Modernization Frame" from the beginning. The theory of "Good Interaction" is an endeavor to rethink and exceed the western research frame of civil society. However, it is a theory to describe the ideal relation between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other than to explain the realization of current China. And the theories such as State Corporatism, Autonomy and Embedment, Selectively Control also have some limitations when applied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Wenzhou Chambers of Commerce shows that a special model of civil society has come into being, which forms spontaneously due to the particular civil traditions and private economic prosperity, develops rapidly under the assist and cultiv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is provided with double characteristics of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in a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with governments. This can be named as Wenzhou Model of China's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indicates the experiences of Wenzhou are particular, but it does not mean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model can be extended, and the concept also shows it is possible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a's civil society to exceed the existent controversies and advance a new analytical approach.

Keywords: China's civil society, Wenzhou chambers of commerce, Wenzhou model, Theory frame, Case study

The Principle of Interests Balancing in the Protection of Biotechnology Patents (48)

Zhang Bingsheng, Chen Dandan (Law School of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Abstract: It involves many complex interests in the protection of biotechnology patents, however, there are three pairs of basic interest subjects, which are patentees and social public, patentees and gene provider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the balance of these interests, the first thing is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and reasonable scope of protection, then handle the relation of "restrict and anti-restrict" correctly and maintain dynamic balancing of interests, lastly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the three pairs of basic interest subject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interests balancing.

Keywords: Biotechnology patent, Interests balancing